

前 言

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自从 1982 年国务院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83 年教育部批准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来，这项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培养古籍整理人才，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成立古典文献专业，还招收古籍整理研究生，^① 举办古籍整理讲习班，并开设了各种不同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授整理古籍所需要的各种学问；一类是传授整理古籍的方法、工序及其有关知识。前一类中的有些课程过去在高等院校里开设过，多少还有一些现成的论著或讲义。后一类则仅有几本讲校勘的书，而且其中除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外，多只讲校勘沿革而未必切于实用。

当前，已经从事古籍整理的青年同志中有许多人对工作尚缺乏经验；年长的同志虽然有经验，有学识，但也没有及时地把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总结出来，所以，急需一部全面讲述整理方法、工序的论著，以引导青年同志们升堂入室。

这里主要是指硕士研究生，有古文献博士点能招收博士生是极个别的

我并不是整理古籍的专业工作者，我的本行是唐史研究，外加版本学、目录学。可能由于后者和古籍整理关系密切，学校里要我兼任古籍整理研究生的导师，并给古籍整理讲习班的学员讲课，而且，除给学员和研究生讲版本学、目录学外，还要讲一些整理古籍的方法、工序和有关知识。好在自己读了几十年的书，即使在十年动乱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仍没有停止和古籍打交道，前人整理古籍的成果以及若干年来出版的经过整理的古籍新本也多所涉猎，对如何整理古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现在既有需要，就把这些看法整理出来，写成专书，一方面可作为授课的讲义，另方面也可供从事此项工作的青年同志参考。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 如果继续沿用“校勘学”自己已不复合适。叫“校勘标点注译……学”，听起来也感到别扭。而且，校勘、标点、注译等整理古籍的工作虽然确是学问，不能像某些人那样把它看成低级玩意，不算科研，不能作为学术成果来获得学位职称。但要讲得真像门学问，充分体现其科学性，倒也颇不容易，至少我目前无此水平。因此对“校勘学”、“校勘标点注译……学”的“学”字实不敢高攀而去掉“学”字光叫“校勘标点注译……”更不像书名。考虑再三，索性借用“古籍整理”这个现成题目再加上“概论”二字，把这本书叫做《古籍整理概论》，以示它只是一本粗浅的入门书，而非学术性的高文鸿著云尔。

绪 论

任何学问都有一定的领域。
什 么 是 要知道‘古籍整理’这门学问的领
古 籍 域 先得弄清楚什么叫‘古籍’。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

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这都不存在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并不十分清楚。如有人谈我国书的历史，说最早的书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后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这就不对。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我国殷商时已开始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当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

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当时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过去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我国最早的书 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当然被公认为古籍。

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这和史的分期有点不同。我国历史现在一般从有史以来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算作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所以 1840 年以后的历史就划入近代史。但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学术文化马上统统起根本性的变化。从 1840 年到辛亥革命清朝统治结束的七十年间，新撰写的书籍中，绝大部分的内容或形式都和前此的古籍没有多少不同。因此，把清代末年作为古籍的下限要比 1840 年作为下限来得合

适。当然，这个下限仍旧是粗线条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范围。采用新体裁对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释，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对古籍的整理研究。

我国的古籍在数量上自以用汉文撰写的为最多。此外，还有用满、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当然也是我国的古籍。只是因为整理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需要另一套专门学问，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汉文的不尽相同，因此通常所谓整理古籍只限于汉文古籍。至于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应如何整理，应由有关专家另写专文专书，本书恕不涉及。

弄清楚什么是“古籍”之后，
古籍整理的涵义 就可以进而谈古籍整理。古籍整
和方法工序 理者，是对原有的古籍作种种加
工，而这些加工的目的在于使古籍
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读利用，这就是古籍整理的涵义，或者可以说是古籍整理的领域。超越这个领域，如撰写讲述某种古籍的论文，以及撰写对于某种古籍的研究专著，尽管学术价值很高，也不算古籍整理而只能算古籍研究。

说具体点，古籍整理加工究竟包括那些方法或所谓方式，以及那些重要的工序？对此，现在还没有比较一致的说法，这里姑且谈谈我个人的理解：

(1) 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

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2) 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 做索引 就更不容易了。

(3) 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4) 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5) 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 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6)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7)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8)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近年来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9)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学问。

(10)附录。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有些古籍本来有附录，有些虽无附录，但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来编成附录。如何收集、如何编都有讲究，不可等闲视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项。古籍整理工作说具体点是要做这十项工作，或者说，这十项工作构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因此，这本《古籍整理概论》就主要按照这十项来讲说。只是由于“今译”可讲的比较少一些，同时也由于它实际上是“注释”的延续，因此把它和“注释”并在一起而名之为“注译”。“序跋”、“附录”内容都比较少，加上“存旧”问题作为一章名之曰“其他”。

要把古籍整理好，还需要掌握
和古籍整理 哪些有关的学问？这些学问可以
有关的学问 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古籍通用的，再一种是某些古籍所专用的。

各种古籍通用的，有：

目录学。这不是图书馆工作所需要的讲如何分类编目的目录学，也不是讲我国分类编目历史的目录学，而是讲我国古籍源流的目录学，即是指在我国古代先后出现过哪些重要的古籍，现在还保存了哪些重要的古籍，作者是谁，内容是什么，在当时和今天各有什么价值等等，因此，严格地讲可称之为古籍目录学。如果整理古籍的人连这种古籍目录学都没学过，就不可能知道哪些古籍要整理，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整理。

版本学。严格地讲是古籍版本学，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讲如何鉴别古籍的版本，包括各个时代的刻本和抄本、稿本、批校本；一是讲每种古籍有过哪些版本，哪个善，哪个不善，其间有什么渊源递嬗的关系。后者也可以称做版本目录学，即讲各种古籍的版本的目录学。整理古籍如果不懂这门学问，就根本无从选择底本，选择对校本，一切整理工作也就无从进行。

但目录学和版本学这两门学问都自有其体系，自

成其为专门的、独立的学问。这两门学问不仅古籍整理用得上，对其他工作，如研究古代语文、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以及鉴别古籍善本、编制古籍书目等等都用得上。因此，尽管这两门学问是古籍整理所适用的、必不可少的学问，但在这本《古籍整理概论》里却只能在必要时简单地谈一些，详细内容另作独立的课程来讲授。

此外 还有一门文献学 近来又多称之为“古典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者，是研究历史上的文献而非当前的文献之谓，和古典文献学、文献学其实只是一回事。但文献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则说法颇多出入。有人说：“张之洞《书目答问》末附列清代学者姓名略，将学有专长的名家按类分列。但有时也显现出这一方法的局限，例如一个钱大昕，既列入经学家，又列入史学家，又列入小学家，又列入算学家，又列入校勘学家，又列入金石学家。这是由于他的治学范围很广博，造诣都极精湛，不可以单从某一方面去肯定他。如果把他归入文献学家，那就包括无遗。”这种说法是把我国过去所有的学问都算作文献学，连中式算学也算作文献学的一部分，把文献学变成了民国初年流行过的所谓“国学”一词的同义语，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已很不科学。还有这样的主张：“文献工作者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是在“对文献进行了整理、编纂、注释工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将之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

甚至说“司马迁写《史记》 马克思写《资本论》 ”,成为世界上整理历史文献最成功的人”。这是把文献学变成撰写历史书,并且把马克思所从事的理论工作也看成是整理文献。这种讲法当然也不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比较平实一点,文献学即古典或历史文献学的涵义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说:(1)文献者 不仅包括书籍即古籍,还包括古籍以外用文字写出来的如甲骨文、金文、碑刻、档案、户籍、契约、信札之类 没有文字的古器物、绘画之类则不算。(2)文献学者 是讲文献的种类、形成、形式、内容、功用、整理、研究、保管等等。其中单整理一项,就把整个古籍整理工作统统包括了进去,可见文献学的全部内容之庞大。因此,把文献学作为大学本科的一个专业或研究生的专业我认为是合适的,而作为一门课,则实在大得无法讲授,不如分成各门专业课程来得妥当。

至于整理某些古籍所专用的学问,这牵涉很广,因为每一类、甚至每一种古籍都有其特殊性,整理古籍者应该力求掌握古籍作者撰写此古籍时所运用的知识和学问。这里,只能笼统地举例式地谈几种: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 这些是整理先秦两汉古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因为多数古籍时代早,多古字、古音、古义 不在文字、音韵、训诂上下功夫 整理起来就有可能发生困难。至于整理文字、音韵、训诂的古籍,需要具备有关的专业知识自更无待言。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古典诗词研究、韵文研究、散文研究、中国文学史、断代文学研究等,是整理文学方

面的古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当然，由于其他古籍也都是用古典的散文甚至韵文写的，因此整理其他古籍的人，能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自更好。

中国通史、断代史、文化史、史料学等，是整理历史方面的古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同时，整理其他古籍的人对这些也应略有所知，因为一部古籍的撰写总多少和时代有关。至于具体地了解作者，就更离不开必要的历史知识。

中国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等，是整理哲学、宗教方面的古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如果要求高一些，还应学习魏晋玄学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佛教各宗派研究、道教各宗派研究等课程，才能胜任对某些哲学、宗教专书的整理。

考古学和所谓敦煌学，也是整理古籍者应该学习的课程。清末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写卷子本中有许多古籍残篇，解放后在武威发现了写在木简上的《仪礼》残篇，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马王堆等又发现了几种写在帛和木简上的古籍残篇，对这些古写本古籍的整理也属于古籍整理的范围。但这些古写本古籍较之一般古籍更有其特殊性，因此整理者除需要具备各种有关的学问外，还需要学习考古等学问。

以上这些专门课程，应该在大学本科就学习。如果没有学或学得不够，则在进入古籍整理讲习班或考上古籍整理研究生后再择要补课。至于《古籍整理概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这么多专业课的内容包括进去的，除非必要时略略涉及一下。

底 本

(一) 优 劣

什 么 是
底 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本子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本子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一种古籍如果有几个不同的本子，其中总会有优劣之分。影印固然要用优舍劣，而在校勘、标点、注释、今译、做索引时也应避免用劣、尽量选优作为底本。

善 本 的
两 种 涵 义

劣的本子通称为“劣本”或“恶本”，优良的好本子则不称“优本”而称“善本”。“善本”这个词之见于文献似始于北宋。如江

少虞《皇宋事实类苑》卷三一“藏书之府”第十八条载：“嘉祐四年 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书》 世间罕有善本 未行之学官，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这时的所谓“善本”，显然只是指书籍之校勘精审者而言，别无其他涵义。

按照这个涵义，宋刻本并不都是善本，因为除官刻的国子监本、公使库本以及某些家刻本在校勘上比较精审，堪称为善本外，坊刻本中如福建建阳的麻沙本之类并没有作过认真校勘，不仅够不上善本，有些甚至是恶本。而且，宋刻本在宋人眼里等于今人眼里的新出版物，即使精善的国子监本也未见得受到重视。试看，北宋末大藏书家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述她在避金兵南行时“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可见监本在当时并不珍贵。至于坊肆恶本，更只是小学生上学堂所背书包里的货色，正如今天对待学校课本一样，谁也不会把它珍藏起来当宝贝。

由于自然损耗，再加上天灾人祸，到明代中叶，宋本就少起来了。“物以希为贵”，宋本甚至元本逐渐成为收藏的对象。如明嘉靖时权相严嵩倒台后被抄没的财产清单中就开有宋版书若干部，和金银珠玉珍宝并列。到了清代，乾嘉时大藏书家黄丕烈因为收藏了

一百多部宋本，就以“百宋一墨”名其书斋，并且目号“佞宋主人”。清后期四大藏书家中的杨以增得到了宋本《毛诗》、三礼和四史，也题其书斋为“四经四史之斋”。另一个陆心源认为其收藏宋本之多超过了黄丕烈，更以“皕宋楼”自夸。当然，对他们这种做法并没有必要加以非议，这么做至少对保存已成为文物的宋元旧本书有好处。但他们对这些已成为文物的旧本书并不另找一个名称，却承用了过去的“善本”之称，这就弄混淆了“善本”的涵义。

光绪初，张之洞提督四川学政时编写过一本《輶轩语》，在“论读书”条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一、二仍是从校勘来讲的，三则把善本当成了文物。稍后，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中，就将善本归纳为旧刻、精本、旧抄、旧校四类。其中旧刻指的是宋元本，精本指的是明洪武至嘉靖时刻本，包括少数“雕刻既工，世鲜传本”的万历以后刻本，加上旧抄、旧校，都是视为文物的善本。但在精本中又说洪武至嘉靖时本中“足本、孤本，所在皆是”，在旧校中也说“补脱文，正误字，有功后学不浅”，这样，又把校勘精审的涵义混杂了进去。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古籍善本，对“善本”的涵义又颇多议论，并出现了所谓“三性”、“九条”之说。“三性”者，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之谓，而“九条”则是如何才算善本的具体规定。其实，“三性”中的后两性很难成立。如清末民国初覆刻宋元本，其

精工有转胜于明仿宋刻者，很具备艺术代表性，但由于时代太近，便不能视为“善本”。在清末民国初，还有一些高水平学术著作仍雕版印刷，很具备学术资料性，但也不能列入“善本”之中，原因仍是时代太近。可见真起作用的只有一个即历史文物性，是“一性”而不是什么“三性”。此外，“九条”中成问题的也不少，如以乾隆时作为善与不善的界限，说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为善本，殊不知清刻本中真正难得、堪称文物的书，一部分在清初，多缘涉及怀念故明而遭禁毁；一部分在道光、咸丰时，则由于当时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所刻书板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而被毁。乾隆刻板虽毁，但印书已多流传，道、咸刻板则印书无几，故板毁后遂成罕见之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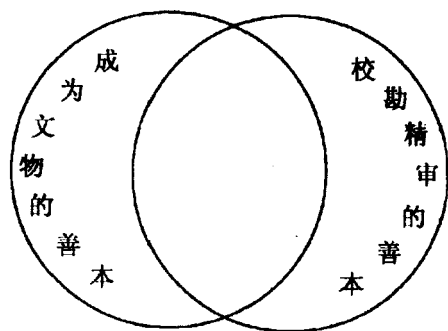
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纠缠，我主张索性把所谓“善本”区分为两种涵义：

(1)一种涵义是凡成为文物的古籍都是善本。宋刻本 元刻本 明嘉靖以前刻本 明活字本 明抄本 清前期旧抄本和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清人就视为善本，今天当然更是善本。明万历以后少见的和印制精美的刻本，清代少见的或印制特别精美的刻本、活字本，民国时特别少见的刻本，以及清中叶以后少见的抄本，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在今天看来也可以定为善本。这里主要贯彻了“物以希为贵”的原则。至于将来，譬如过了若干年，清代、民国时的刻本又稀少起来，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很可能再把它提升为善本。可见这种具有文物涵义的善本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的。

(2)再一种涵义是校勘精审的才是善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本子善就永远是善，不善就永远是不善，而决不会象文物涵义的善本那样，标准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动。这种涵义的善本不受时间的制约，它可以是清末民国时的刻本，甚至可以是近年来新出版的影印本、铅字排印本，当然也可以是宋元本、明本、旧抄本、稿本、批校本等等成为了文物的善本。

因此有相当多的本子会既是校勘精审的善本，又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也有一些本子只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不是校勘精审的善本，还有一些本子则只是校



勘精审的善本，不是成为文物的善本。右上面的图就表示这两种涵义的善本的关系。

整理古籍，首先要求消灭在要用哪种涵义 传抄刊刻中产生的错误脱漏，使的善本作为底本 古籍尽可能回复其本来面貌，所以 整理古籍所用的底本 也理所当然地要用校勘精审、比较接近原书面貌的善本作为底本。

当然，如果同样是校勘精审的善本，其中一个本子同时又是成为文物的善本如宋本、元本之类，而另

一个则只是清人覆刻的本子，不成其为文物，则最好用前者而不用后者。因为书一经覆刻总难免有点走样，总不如不走样的原刻本，用原刻本总比用覆刻本让人放心。如果不是覆刻而是影印本，则自然和原本一样，照理都可以用作底本。只是有些影印本已经过描润，有时个别字会描错，因此，如有可能最好把原本对过后再使用。

（二）选择

选择底本和接受	要选择合适的善本作
版本目录的研究成果	为底本，必须学好版本学，
	尤其是其中的版本目录学。

在“绪论”里已经讲过，版本学是一门独立的课程，而版本目录学在这门课程中又占了很大的比重。这里，只就选择底本的需要择其要点讲一些。

对版本目录 即一种古籍有哪些版本 哪个善 哪个不善，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可以说，从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勘整理官书开始，历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对此非常重视（可参考本书“校勘”篇“源流”章），但明以前人所见到的版本今天大部分已不存在了。对至今仍存在的古籍版本，包括稀见的宋本、元本、明以来的大量刻本，以及活字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作收集研究，是开始于明后期的藏书家们，特别是清代的藏书家，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研究成果。今